

一、概 述

世界近代前期哲学思想史 其历史时限 上起公元 15 世纪中叶 ,下至 17 世纪后期。在西方 ,它大体上始自公元 1453 年拜占庭帝国灭亡之时 止于 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结束之日。在东方 则约略相当于中国的明代 即自 1368 年明王朝开国至 1644 年清军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为止。按照西方哲学史家文德尔班的划分方法 这一段思想史正好称之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 ,亦即中国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宋明理学”中的明代理学时期。

这一段思想史 ,时间固不算长 ,但它的内容却极其丰富 ,历史地位也十分显赫。它上承数千年文明传统 ,下开数百年历史辉煌。它前瞻后顾 自成一体 ,它超越前人 影响巨大 ,它确立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形象 ,同时也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进程。

讲清楚这一段历史 ,实在并非一件易事 ,而它又分明清清楚楚地摆在人们面前。似乎即使不作深入研究 ,人人也能明白它存在的含义——实在如今世界上 50 多亿人口 但凡有点文化 有几个不知道文艺复兴运动的 ?一方面 ,它精深博大 ,一方面它又尽人皆知。换句话说 正因为它精深博大 所以才显得平凡无奇 ,而又正因为它具有这般平凡无奇的大风度 ,才更显示了它博大

精深文化涵义。何况彼时的世界既有灿烂的西方文明又有依然强大的东方文明。所以概述这一段思想史，就显得尤其头绪纷繁，路曲峰多。这里择要而言，只谈五个基本方面。

1. 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性时代

这个时代，在人类思想文明发展史上，其地位十分紧要。简而言之，这是继人类历史上古希腊古罗马和中国先秦时代之后的又一个黄金阶段。

人类古代史上的黄金时代，首推古希腊古罗马和中国的先秦时代。这两个时代，可谓东、西辉映，双峰并峙。在一些西方人看来，自然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高山仰止，未有敌手，但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先秦文化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份不可多得的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虽然人类自诞生以来，无时无刻不在进步，人类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发展。但是，人类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不是均速的，而是波澜起伏的——有辉煌时代，也有黑暗时期。以西方思想史论，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是第一个辉煌时代，而自古罗马文化式微之后，中途大约经过 15 个世纪，也未曾创造出可以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相匹敌的文明成果。

15 世纪中叶之前，虽然西方哲学思想史上也曾出现过影响各异的思想流派，也有过各式各样的创造和争论，也曾出现过罗吉尔·培根和托马斯·阿奎那那样的著名哲学家，但是他们的历史成就，仍然不能和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大哲学家们相提并论。可以说，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过后，人类盼望一个新的属于未来的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已经为时久矣，而这个时代，终于

在文艺复兴的旗帜之下，以前所未有的气势、成就和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之后，西方哲学史上，又出现了一个可以和古代黄金时期相比美，而且远远超越了前贤的新的辉煌时期。

在东方 则自秦汉以来 尤其是自董仲舒建议“废黜百家 独尊儒术”以来，也没有一个历史时代足以和先秦时期的思想文明一较高下。宋代理学尽管影响巨大，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时代，也可以看作中国古典儒学走进其历史发展逻辑的极限境地。宋明理学固称一体，但二者多有区别。宋代理学意在集历代儒学发展之大成，而后综合发展之，成为中国儒学历史发展的逻辑归宿。明代心学固然与宋代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是传统儒学走向新的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契机。旧理学至王阳明 已经“山穷水尽疑无路”唯有接受历史挑战 走向中国式的启蒙时代，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王阳明应运而生，于是王学终于背离初衷，成为一面反叛的旗帜，于是有了明末清初三位启蒙人物的出现。但是即使这些思想家以及后来出现的更为卓越的思想人物，依然不足以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段落。正如历史已经证明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前途，首先应该建立在综合东、西方哲学文化成就的基础之上，中国现代哲学应该成为一切人类哲学文明成果的卓越继承人。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尽管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大不均衡，但严格地讲，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史，亦即人类近代思想文明史，即是发端于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时代的西方哲学 人物济济 流派众多 著作浩繁 影响巨大。

评价历史成就的基本标准，是看它对历史的贡献大小。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的人物，不但继承了先人，而且超越了先人。中世纪时期的思想界人物，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伟人相比，总不免

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样子，甚至有南辕北辙、倒行逆施之嫌，虽有贡献如许，然多在细节末节方面下功夫，尽管精雕细刻，终不成鸿篇巨制，仿佛流溪涓滴，缺乏长江大河的浩瀚景象。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界则不同。文艺复兴至今，不过 500 年时间，悠悠 500 年间，多少新思想、新见解、新理论、新体系、新风格、新流派、新人物层出不穷，纷至沓来。他们以自己的实际成就，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之上，不但超越了前人，而且和 1500 年前的思想巨人遥相问候，平起平坐。

有人说，今人唯有超越古人，才有成为古人的资格。不错，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就是以自己的历史成就而展示了自己的时代形象。对于生活在 20 世纪的人们来说，他们已成古人，而且是不朽于人类文明的一代伟人。

这个历史阶段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这个时期的思想人物，不但作出了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巨大贡献，而且在其历史时空所允许的发展广度、长度、深度等方面也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历史境地。

所谓发展广度，即指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不是如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那样，只集中在欧洲南部的两个半岛地区，而是遍布欧洲大陆，可以说，无论南欧、北欧，无论大陆、岛国，无论平原、山地，无论大国、小国，随着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但见东边日出西边雨，各领风骚，精彩纷呈。

所谓发展长度，即自文艺复兴以来，直到 19 世纪晚期，在整个西方近代历史上，思想界的著名代表前赴后继，英才辈出，杰出的哲学著作层出不穷，从未间断。历史的发展既有高潮也有低潮，但这段历时数百年的迅猛发展时期，在人类历史上，纵非绝无仅有，也堪谓十分罕见。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有五六百年

时间，但这五六百年间，古希腊古罗马经历了发展、壮大、繁荣、强盛、衰微和死亡的过程，此后进入低谷，不复昔时景色。西方近代文明，因为其自身历史的文明内涵异常丰富，表现在哲学领域，也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而且春华秋实，各具风采，南腔北调，皆成美声。这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是不曾有过的壮丽景象。

所谓发展深度，是说它们以自己的思想内涵和实际影响超越了任何一个既往时代。它们的历史地位或许该与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最重要的文明时期相提并论，而它的实际成就，又具有更强烈的现实价值和发展价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固为一代之雄，但其思想毕竟距离西方近代文明已遥遥久远；而同样伟大的笛卡尔、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就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创立息息相关了，他们是属于历史未来的新一代思想巨匠。

这一段思想史重要，还因为它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原则，直到数百年后的今天，对于当今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依然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直接的影响。现代西方出现的种种哲学理论、学术流派和各式各样的思想体系，毫无例外地都可以从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的人物与著作中找到依据与渊源。

从思想到体制，无论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模式，还是价值系统，都与西方近代文明一脉相承，一理同源。罗斯福总统的政治理念和潘恩先生的政治理念其实差不了许多。邱吉尔先生的民主思想和洛克先生的民主思想同样相去无几。对于西方以外的各个民族而言，为着自身的强盛和现代化需要，了解西方近代文明史上的思想、理论和著作，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历史性责任。真理本无国界，尤其那些已为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真理，更是全人类的共有财富。

2. 鲜明的时代主题：人文、科学、民主

人文、科学、民主可以说既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没有人文运动，没有相应的科学成就，没有近代民主进程，也就没有西方近代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原因。而西方近代哲学建立、传播的历史逻辑，又在于启蒙、推动、概括、升华和完善西方近代人文、科学与民主的发展。这样看来，它们又是结果。换句话说，它们既是近代西方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归宿点。好像一个螺旋上升的圆圈，从一个特定的始点出发，经过某种必要的发展轨迹，在形式上似乎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之上——并非真的回到原先的起点，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与原起点的同位发展。

人文、科学与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天下哪有这般省力的事！它们作为历史发展的公认主题，也不是一并提出，更不是同时被认同的。大体说来，人文思想出现最早，影响最大。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想，就是以人文思想作为自己的主调的。当然不能因此就下结论说，先有人文思潮，后有科学时代。但科学时代的成熟标志，在于牛顿力学的完成，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民主制度在欧洲的建立，时间还要晚些。实际上，西方近代文明并非一开始就追求民主。相反，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民主不是主题，而建立统一的强大的民族国家才是主题。这个主题先在意大利，后在英格兰，尔后才在欧洲大陆渐次得以实现。先要强大，后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强大，没有强大也无力支撑民主。这好像是一个历史的幽默，又好像是一道很难予以直观理解的悖论命题。而彼时的思想家们，都是自觉或不自觉、有序或

无序地为着达到这个目标而追求、探索、奋斗乃至英勇献身的。同时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深入，这种人文——科学——民主的历史主调，也日益清晰起来。

西方大哲学家罗素说过：“通常谓之‘近代’的这段历史时期，人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的思想见解有许多不同。其中两点最重要，即教会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旁的分歧和这两点全有连带关系。近代文化宁可说是一种世俗文化而不是僧侣文化。”^①

这段话讲得极中腴理。而所谓世俗文化，其实就是人文文化。中世纪的西方文化，乃是一种神学文化。因为它是以基督教神学为主旨的。哲学也罢，科学也罢，或者不允许存在，即使存在，也只能成为神学的附庸。神学是主，哲学是仆。虽有哲学不能成为思想主流，虽有科学不能与神学相忤。中世纪世俗文化之低下，反映了人的地位的卑微。而世俗文化取代神学文化的标志，就是人文主义大旗举起来，人文主义思想立起来：人要脱离上帝，人要超越自己，人要在上帝面前挺起腰杆，人要以自己的观点解释世界，人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生存，人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人要把本来属于自己而后来被上帝拿去的地位讨还回来。

只是这种人文世俗文化的兴起，并非发端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近代史”而已。它实际上起始于文艺复兴运动。它大约在公元1350年前后就已初露锋芒，经一百年后，到了1453年左右，已经形成气候。自此，人文主义思想家们不仅要潜移默化地去改变旧世界，而且要大声疾呼地阐扬新世界了，尽管这个新世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页。

界在诞生过程中，犹不免如婴儿降生一般，会带来一些旧的污痕与血迹。

3. 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兴起的四大成因

如上所言，西方近代哲学史，是人类思想文明史上的巨大辉煌期，这不仅因为它取得了前人所从来不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而且因为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世纪。这时期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不但与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水火不容，与中世纪的哲学家们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和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哲学思想家也有本质区别——尽管他们常常打着复兴的旗帜，实际上其所作所为，都是那些伟大的先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崇高事业。

其所以如此，不但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渊博学识的人类通才，而且还因为这些通才有了赖以生存的非常优越的文化环境和历史环境。简而言之，可以称之为近代哲学得以兴起和繁荣的四大成因。

（1）人文主义日强日盛

欧洲人文主义，始发于意大利，以后次第传向北方，但人文主义思潮和创作，首先不表现在哲学方面。实在说，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无暇进行那么深入细致的思考，也无法作出石破天惊式的警言慧语。意大利的人文思想，最早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它们不是以抽象思维方式，而是以形象思维方式，首先登上历史舞台。而且这种形象思维，也不以大悲大喜为特色，他们笔下讴歌的并非古希腊悲剧中充满崇高情感和壮丽行为的英雄好汉。他

们并非人类的救世主，又不是半人半神的怪物，也不以超人式的传奇形象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更喜欢以普通人的身份，以凡夫俗子的形象去表现自己的情欲与物欲。他们的行为不但绝少英雄主义气概，甚至连正人君子也不屑去做。他们重情更甚于重理，重欲又甚于重情。他们中最早期的代表作则是但丁的《神曲》和薄伽丘的《十日谈》。以后又有了瑰丽无比、气象空前的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为代表的雕塑与绘画。这些绘画和雕塑，也以人的面貌、人的追求、人的本质、人的智慧为自己的追求与本位。

《神曲》被认为是“中世纪文学哲学之总汇”但丁被称为“诗界之圣多马”。但那方式，却是站在世纪之交的新的思维方式的形象展现。但丁以一个凡人的姿态进入地狱、进入神界、进入天堂，这在中世纪神学传统中不唯不可思议，而且近乎大逆不道。但他还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以一个凡人的身份去评论三界的曲折是非，以此展示他作为一代世纪新人的思想风范。

但丁已然不同凡响，薄伽丘还要变本加厉。如果说但丁还可以看作属于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那么薄伽丘则已经全然属于新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十日谈》借书中人之口谈情论欲无所顾忌。几百年间，有多少人认为是诲淫之作，必欲禁之毁之而后快。其实，《十日谈》何曾是淫书，书中人不过是代表世人，尤其是代表那些已经具有资本主义世欲文明的一代新人，抒发了他们内心的几点真情实意而已。

实在说，资本主义文明从一开始就缺少雄伟壮丽的精神风貌，但他们也无须如此。他们正是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形象，以金钱为旨圭，以个人主义为理想，以竞争为生存方式，以取

得更多的财富为荣耀而走上历史舞台的。但是他们偏能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在一片耀眼夺神的金钱与情欲后面，又体现出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所谓人的精神。

这当然不是说，只有偷情才是爱情，只有纵情享乐才是近代文明。而是说，《十日谈》正是以这种世欲性的行为和追求证明了人的自我需求的天然合理性——他无须样样向神明请示，甚至不屑于与神的世界同流合污。

人文主义传统的成熟体现，则表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形象艺术创造特别是绘画与雕塑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比之文学作品，享有更为崇高的历史地位，而他们之中的杰出创作者们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提香等，成就尤其突出，影响尤其巨大。他们的创作题材，虽然大体上依然不出于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学的大范围之外，但昔日那些人们只能充满敬畏、顶礼膜拜的神灵一经他们的笔墨工具，都具有了如君似我、类乎常人的风格与情调。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是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但那画中的人物其喜、怒、哀、愁更似凡人如我。而他那千古绝唱一般的《蒙娜·丽莎》只不过是一位洋溢着人间情趣的迷人少妇而已。同样拉斐尔的圣母像最是雍容华贵，然而，她使我们得到的情绪反映，绝非神圣不可仰视，而是充满了田园式的温馨情致。至于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浑不似天上的神明更近乎人间的烈士。而提香笔下的少女尤其远离神仙灵秀，从头到脚，一派青春情欲。

人啊，人，你竟是这般美丽，这就是人文主义艺术大师们的发现；

人啊，人，你本该当如此，这就是人文主义艺术大师的价值观念。

而他们的这一切创作，都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

何谓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就是毫无保留地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发展和幸福的特定的历史性思潮。

人文主义的意义何在？就在于它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及其封建文化体系。

不消说，西方人文传统，正是西方哲学得以发达的一大原因。

（2）近代科学蓬勃兴起

自然科学是宗教神学的死对头，在本质上，二者是势不两立的；在宗教神学占据文化统治地位的时候，尤其如此。在那样的时代，除非自然科学永不发展，如一旦开始发展，首先冲击的对象，必然是宗教与神学。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因为社会文化系统的演变，尤其是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后来海外市场的发现，也随之发达起来。这时期的自然科学成就，是全方位的，无论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医学、解剖学、生物学、植物学、化学，都取得重大进展，有些则是具有划时代价值的进展和突破。它们不但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而且以打破专业界线的传播方式，成为使整个社会文化系统得以改变的基石与门径。特别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以后血液循环论的出现，尤其具有特别的历史含义。因为这两种学说，对于传统的宗教神学，乃是致命的冲击。虽然这些学说的创立者，其本意并非与神学作对，历史的幽默在于，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哥白尼生活的时代，在天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托勒密的

地球中心说。地球中心说虽然不合天体的真实，但作为一种认识自然界的方式，也自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依据。其实，太阳中心说也不合乎天体的真实，但要害不在这里，而在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在中世纪得到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而且给了它以超自然的神学解释。天主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不但创造了人，而且要给人寻找一个适宜居住的场所，于是选择了宇宙的中心——地球。人是万物之灵，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上帝创造一切，唯有如此，天主教会才能对整个世界替上帝感到满意。

然而，哥白尼以新的方法，科学地证明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且不太科学地证明了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中心说和天主教的观念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哥白尼既相信上帝，更相信科学，于是他写了《天体运行论》一书。他知道这书的发表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于是他便不发表它，直到 1543 年，他才同意将其出版。可这时候，他本人业已病入膏肓，很快就要与这恼人的世界永别了。

当然，有些后世的聪明人便因此指责他是一个怯懦者。其实，哥白尼骨子里从来就是一位大无畏的斗士。他曾经为他的《天体运行论》写过一篇序言，说：“对数学一窍不通的无聊的空谈家会摘引《圣经》的章句加以曲解来对我的著作进行非难和攻击，……我绝不予以理睬，我鄙视他们，把他们的政论视同痴人说梦，加以摒弃。”^①很可惜，这序言直到 300 年后才得以公诸于世。

地球在转动，已经使天主教会愤怒不已，哈维的血液循环论又使天主教会面临新的信仰危机。

哈维其生也晚，但在他前面，已有维萨里和塞尔维特作先驱。

维萨里出身于医学世家，但他具备新时代的头脑。他不盲从旧说，而深信解剖学的科学价值，认为唯有亲自参加解剖，直接观察人体构造，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在他生活的时代，虽然解剖人体已被认可，但医生并不直接参予其事，而是由理发师来担当此任。维萨里一改旧风，亲自“操刀”，而且一边解剖一边对照研究人体的构造。因为他有这样的基础，所以他最有资格也最有信心对当时盛行的盖仑人体学进行挑战。他指出盖仑人体学著作中有 200 处错误——以具有 200 处错误的人体理解作为治病的基础，可怕也夫，可叹也夫！盖仑人体学之所以有如此多的错误，因为他的学说不是来自解剖实验，而是来自对猕猴的观察。

维萨里不知道血液循环——他本来是有可能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贡献在于他的《人体的构造》一书。这本书以解剖经验作基础，按人的生理系统分别叙述了人体的构造。自然，他的说学中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他的学说仍不失于当时最为先进的人体科学著作。他的学说的人文价值在于；他以解剖学作为科学根据，否定了上帝用男人肋骨创造出女人的神话，否定了耶稣可以通过复活节使死人复活的无稽之谈。

维萨里之后，又有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塞尔维特是心肺循环的发现者，在他的著名著作《基督教的复原》中，他阐述了血液循环的过程。他反对盖仑的三种灵气说，但承认灵气的存在。他认为确有一种灵气，而这种灵气就存在于空气之中。这灵气通过呼吸进入肺脏，在那里与来自左心室的血液相遇，经过净化，然后进入右心室，之后这灵气被送往全身。实在说，塞尔维特未能

在他的科学发现中清除基督教的影响，但他对心、肺两大系统的统一解释，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科学价值。

重要的是，维萨里和塞尔维特尽管并没有真正了解血液循环论这一重大课题，但他们的理论已经引起了教会的极大不满。维萨里也曾面临“故意杀人”的诬告，以致使他不幸在去宗教圣地——耶路撒冷朝拜赎罪归来时，染病身死。塞尔维特的结局更其悲惨，他被加尔文教活活烧死，而且为着惩罚他对宗教的大不敬，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小时。

然而，教会固然可以烧死布鲁诺，但不能停止地球的转动，同样他们可以烧死塞尔维特，但人的血液——包括烧人者的血液依然要循环。上帝在天国固然可以战胜一切，然而在科学面前，一样束手无策，没法可想。然而这还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端罢了。哥白尼后面还有伽里略和牛顿；塞尔维特后面还有哈维先生在准备着哩。

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还有西方 17 世纪的科学时代，到了那个时候，科学已经不再是神学的奴仆，而渐次成为近代文明的主力军了。

不消说，正是近代西方科学的启迪，支持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发达；反之，唯其有科学作自己的坚实后盾，西方近代哲学才能这般聪明通达，所向披靡。

③ 宗教改革 频添动力

科学技术的发达，已使传统宗教势力苦恼无边；宗教内部的改变，更令其内外交困，朝不保夕。有人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大凡一种社会力量的破败，指望以外力来摧毁它，纵然有这可能，也一定极其不易。但若先从内里动乱起来，一经发动，

五内俱焚 其后果便可想而知。换句话说 只有发自内心的变革，才是真正的变革，它的影响也往往更为深沉痛切，并且更见成效。

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是一支生力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生力军几乎成为一支决定成败的主力军。而它的主帅，正是鼎鼎大名的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其实并非要置天主教会于死地。马丁·路德本人就是一位神职人员，而且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不但未曾想过要从根本上反对教会，而且对于教会真正是一往情深。而对于一切与《圣经》相背的内容 包括哥白尼的天体学说，他都是坚决反对，绝难容忍的。但即使他是这样一位虔诚无私的宗教人士，对于当时教会的腐败和昏暗也终于忍无可忍，由此可知，中世纪的教会制度是非改革不可的了。

马丁·路德最初的壮举，即是他的“95条论纲”。而“95条论纲”的中心 则是反对“赎罪符”主张“因信称义”。路德生活的时代，教会推行赎罪活动已经久矣，如十字军东征，即被宣传为是教徒得到赎罪的大好时机。所谓“赎罪符”就是向教会捐钱 以钱赎罪。因为你有钱 因为你交了钱 所以上帝见钱眼开 便让你大摇大摆地进入天堂。这办法之荒诞不经，实在无须多言。马丁·路德对此不满，而且敢于公开站出来发表自己的反对意见。这意见就是他的“95条论纲”。这论纲一出 支持的人非常之多。由此可以知道，赎罪活动是大不得人心的。一是不得人心，二是不合《圣经》的本义。当时的情况 可谓贤者一呼 应者云集。于是星星之火，一转眼便成燎原之势，很快酿成一场惊心动魄的宗教改革大运动。

“95条论纲”内容并不艰深 而是浅显平和 以理服人，一字

一句明白如话。如第 36 条说：“每一个真正悔过的基督徒 即使没有赎罪符 也可要求完全赦免。”第 45 条说：“应该教训基督徒，如果有人看见穷人而不加理睬，而去花钱买赎罪符，那么他所买的就不是教皇的赎罪符 而是上帝的愤怒。”这些话 其实没有什么 对任何一个读过《圣经》的人来说 原本就该如此。没落者总是要在经典之外偷偷摸摸加上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内容，接着便宣布这些内容不可侵犯，此等伎俩，原来古已有之。路德所言，是为常识，而置常识于罪恶之藪的社会，必定已经到了腐朽没落的时刻，敢于为恢复常识而奔走呼号的人物，即使他并非一位出色的天才，也一定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英勇的战士。

“95 条论纲”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即具有一定的世俗品性。比如其中第 46 条写道：“要告诫那些生活并不富裕的基督徒，为他们的家庭生活保存必需的东西，而决不要在赎罪符上浪费金钱。”一位僧侣 谆谆善诱 讲到世俗财产 而且认为这些财产如属生活所需，则不必交与教会，这是需要勇气的，尤其需要对当时的时代风尚有些深层的体味。而路德正是这样一位人士，并且他还大胆地打破旧有禁忌，与一位逃出寺院的修女结了婚，和她生了一个取名汉斯的儿子。

宗教改革应路德一呼，很快成为一场千千万万人参加的大风暴，以至后来把这风暴的作俑者路德先生都抛到洪流的后面去了。这个且不管他，只说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改革运动，确实为当时的科学进步，为人文思想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方便，增添了动力。宗教改革和人文运动一样，也是该时代文明发展的有机构成。

(4) 工商、市场、城市与商人阶层的成熟壮大

罗素先生认为 近代哲学‘属于’自由主义’文化 换句话说，就是和通商贸易极自然地连在一起的那类文化。’^①

文艺复兴所代表的文明 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文明。而资本主义文明的特点，在于工商业的主导地位，商业城市的大量涌现 世界性大市场的发展 以及科学技术的商品化过程。

在这些因素的排列组合过程中，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则是一件特别重大的历史性事件。现代中国文化学的研究者们 为着总结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 常常愿意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郑和下西洋相比较。但又常因方法不同而结论大异。照我的看法 两个人皆为勇士 两个人的船队都很大 但郑和的船队更大 两个人的影响都非同寻常 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影响更大。郑和下西洋堪称一大壮举，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则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其所以如此 因为在哥伦布背后 有一个朝气蓬勃、急需扩大市场的新兴的工商阶层，而郑和的背后，却只有一位颇有才干却绝没有也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封建皇帝。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找到一个极大的市场，而资本主义文明的兴旺发达，没有充足的市场绝对不行。

除去市场的因素之外 科学技术的应用 在近代欧洲同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培根曾经说过：“我们应该观察各种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 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 第 4 页。